

正确义利观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

罗建波

内容提要 正确义利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价值观。其核心要义在于全面、辩证地阐述了“义”与“利”的关系，集中表达了中国外交义利兼顾、弘义融利的道义观和责任观，公道正义、平等相待的权力观和秩序观，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合作观与发展观。正确利益观集中展现了中国外交“天下大同”的世界追求、“自我约束”的内敛风格、“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言必信、行必果”的实践作风。中国在践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正确义利观过程中，要以“一带一路”为新纽带、以“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为新契机、以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新增长点、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新助力。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进取方向，正是通过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更多分享中国机遇，通过向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观念，在维护增进自身利益的同时，全面助推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发展与治理进程。

关键词 正确义利观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 发展中国家 非洲

作者简介 罗建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教授（北京 10009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有了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对自身、对世界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判断，中国外交也因此具有了新的使命与担当。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共同福祉，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新的历史交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使命和追求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2018年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正是着眼全面提升中非互利合作水平，推动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的提出及实践，有助于深化中国与非洲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友谊，有助于解决全球发展问题并推动世界更为均衡的发展，有助于提升中国的道义精神以及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因此，研究正确义利观的内涵及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的身份认同与正确义利观的提出

探讨国家的外交理念创新与实践，离不开对国家身份认同的认识和把握。“身份”或“认同”（Identity）源于拉丁语“Idem”，意为相同的、同样的（即“the same”）。一般认为：“独特的身份在社会中具有三个基本功能，即它将告诉自己我们是谁、告诉他人我们是谁和告诉自己他人是谁。”^①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利益判断与情感诉求，进而深刻影响着它的战略取向、外交选择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中国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存在的，但中国的身份认同自始就不是单一的。中国对外关系在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同时，认为自己既属于被压迫民族，也属于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一员，誓言联合亚非各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②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外交极其困难的时期，中国更是注重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以打破美苏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毛泽东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以宏大的全球视野把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紧密连在了一起，为中国外交找到了最广泛的可以团结甚至倚重的力量。改革开放后，中国一直视自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同时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积极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或“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注重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何谓“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在使用这一概念时，通常指那些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2017 年 7 月，世界银行把 2016 年人均国民总收

① 官力、王红续：《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38 页。

② 谢益显：《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 - 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1 页。

人等于或低于 1 005 美元的国家列为低收入国家，在 1 006 ~ 3 955 美元之间为中低收入国家，在 3 956 ~ 12 235 美元之间为中高收入国家，达到 12 236 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国家。^① 如果按经济标准来衡量，中东产油国、部分拉美国家早已不是发展中国家，甚至中国自己也将很快不属于发展中国家。

表 1 世界经济体发展程度分类

类别	人均 GNI (美元)	亚洲	非洲	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	大洋洲	总计
低收入国家	≤1 005	3	28	0	0	0	0	31
中低收入国家	1 006 ~ 3 955	21	18	4	4	1	5	53
中高收入国家	3 956 ~ 12 235	11	8	10	10	10	7	56
高收入国家	≥12 236	15	1	36	16	3	7	78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统计而成。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概念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认识，认为“发展中国家”自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而具有更为丰富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属性。^② 在中国的外交思维中，当代“发展中国家”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第三世界”的延续和发展，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也与过去亚非拉国家共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一脉相承。虽然第三世界国家早已实现了政治独立，但这些曾经在追求民族独立过程中携手前行的亚非拉国家仍然面临实现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任务，在国际事务中也面临相似的政治和外交需求。在中国外交视野里，“发展中国家”概念既承载一种历史记忆，又有一种现实需要，因而有着一种特殊的归属感、亲近感、认同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将始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一如既往地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重视，集中表达了中国外交的“初心”。

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发展中国家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某些时候甚至是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结构性“支点”。^③ 借助发展中国家

^① World Bank, “World Bank Country and Lending Groups”,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2018-03-27.

^② 罗建波：《亚非复兴视野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历史变迁与世界意义》，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68~83页。

^③ 刘鸿武：《当代中非关系与亚非文明复兴浪潮——关于当代中非关系特殊性质及意义的若干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第29~37页。

的力量，中国在过去曾经打破了外部大国的封锁，得以重返国际社会，并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尊严。在当前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更好地统筹与外部世界关系以及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都有着重大意义。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中国外交可以倚重的力量，是中国深入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合作伙伴，携手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也是中国提升在全球发展领域话语权、彰显自身不断提升的大国责任和道义精神的重要实现路径。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关乎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感召力和话语权。

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直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过去，中国曾帮助亚非国家进行反帝、反殖斗争，在它们赢得政治独立后，又帮助它们实现国家的全面建设和发展。当今世界面临严重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这些和平、发展与治理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①而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担心，一个不断发展的中国是否还是它们当中的一员？是否还会与它们休戚与共、携手并进？它们普遍希望日益强大的中国在国际上继续为它们伸张正义，能给它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能为它们的减贫和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大国，中国基于自身的身份定位和世界情怀，自然需要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伙伴，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自身履行大国责任的重点区域。^②2013 年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便选择了非洲，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也正是在此次访非期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正确义利观理念，后来又在其文章和讲话中数十次提及。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选择了阿联酋及塞内加尔、卢旺达、南非、毛里求斯 4 个非洲国家，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国永远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友谊，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正确义利观的提出，就是向发展中国家表明，中国永远也不会离发展中国家这个大家庭。

中国外交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要维护和增进 14 亿中国人民的根本

^① See World Bank Group, *The Changing Wealth of Nations 2018: Build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Washington DC, 2018, p. 6.

^② 罗建波：《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身份定位与大国责任》，载《西亚非洲》2014 年第 5 期，第 28 ~ 45 页。

利益与福祉，同时也要积极关注和维护世界上最大多数民族、最大多数国家和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其中重要方面便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秉持正确义利观、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为人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提出的外交追求和进取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有了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外交也因此具有了新使命、新追求和新责任。

正确义利观的理论定位与内涵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外交从开局就彰显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深情厚谊和道义精神。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发表《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中国“真实亲诚”的对非合作理念，表达了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深厚情意和无私道义。他明确指出，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他着重强调：“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双方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的力度不会削减只会加强。”^①

在2013年10月24日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②在2014年11月28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全面阐述了正确义利观，他强调，“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要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③在2018年6月22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

① 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26日。

②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897.htm，2018-06-30。

③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章。^①在2018年9月3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在合作中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②。

在理论定位上,正确义利观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种价值观,集中表达了新时代中国对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共享繁荣、命运与共的基本追求,集中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所应当坚持的外交道义和精神。大国应当具有何种精神,展现何种面貌,倡导何种价值观?回顾过去500年世界历史进程,世界大国之所以有全球性影响力和感召力,不只是为了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能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也在于它能够为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方案和智慧,在于它能够为世界提供引领时代发展潮流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正确义利观的提出以及中国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呼吁,是新时代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价值观,必将显著提升中国外交的道义精神。

在理论内涵上,正确义利观的核心在于全面、辩证地阐释了“义”和“利”的关系,集中表达了新时代中国外交对利益、责任与道义的理解。其内涵有三:其一是义利兼顾、弘义融利的道义观和责任观。义利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文化强调义利统一、义利兼顾、取利有道,甚至主张先义后利、重义轻利,舍利取义。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③;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④;墨子则提出“义,利也”^⑤等等。同时,中国文化也不否定或排斥利益,而是认为“利人”“利天下”的行为就是义,“损人利己”“为害天下”的行为就是不义,从而更好地实现了义和利的辩证统一和相互促进。正所谓“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⑥。过去,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反帝、反殖斗争,在国际上注重为发展中国家伸张正

① 习近平:《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② 《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二〇一八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北京),载《人民日报》2018年9月4日。

③ 《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④ 《孟子·告子上》。

⑤ 《墨子·经上八》。

⑥ 《墨子·兼爱中》。

义，是大义；今天，中国注重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减贫和发展，在国际上积极维护它们的应有权益，也是大义。

其二是公道正义、平等相待的权力观与秩序观。大国应该如何获取权力，又如何运用权力？各国应当如何相处，如何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才能更好地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尊严和权益？西方国家的世界观深受传统现实主义的影响，认为国家以绝对的权力和利益为追求目标，据此拟定自身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与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和强权政治逻辑不同，中国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坚持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主张通过对话谈判的方式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反对借人道主义为由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颠覆他国政权的霸道行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努力为它们代言，努力为它们发声。正如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坚定承诺的那样，“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①

其三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合作观与发展观。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实现发展也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政治。携手发展中国家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是当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中最大的“义”。中国积极照顾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坚持在合作中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张开怀抱欢迎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我们要努力把世界机遇转化为中国机遇，把中国机遇转化为世界机遇，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长期积累而未能有效解决的发展问题，帮助它们提高在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大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也自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来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习近平的外交思想体系就是以全面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引领，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追求。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就是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外交实践，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重要途径。正确义利

^①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观就是要把中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利益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乃至更广泛的世界整体利益联系起来，把“中国梦”与“非洲梦”“阿拉伯梦”乃至“世界梦”联系起来。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过程中注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推动与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体现了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无私仁义，体现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正义，体现了新时期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和道义。因此，我们不仅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理解正确义利观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还要从这个高度来理解中国身上肩负的责任和道义。

正确义利观彰显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

正确义利观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要价值观念，它根植于 5 000 年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浸润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情怀，形成于新时代中国外交所具有的宽广的全球视野和不断提升的世界责任意识，因而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个性与特色。

其一是“天下大同”的世界追求。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中国仁人志士历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济世情怀。换言之，人类共处一个地球，各国应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是着眼整个世界历史进程，关注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继承者，也是共产主义的弘扬者和践行者。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有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的胸怀和眼界，今天更有心怀天下、造福世界的志向和夙愿。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向国际舞台中心之际，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意愿、更有信心、更有能力践行自己的世界理想和天下情怀。正确义利观的提出以及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正是对“天下大同”世界理想的集中诠释，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继承和发展。

其二是“自我约束”的内敛风格。中国人对世界理想的追求，并不是通过对外征服、统治和改造实现的，而是通过平等地对外交流、合作、互鉴来实现的，这是一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德境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和平发展道路、正确义利观等外交理念的提出，还是睦邻、富邻、安邻周边政策以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等具体承诺，都体现了中国外交“自我约束”的内敛性。^① 正确义利观的提出，就是中国在逐步成为全面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之际，主动向世界做出的重大承诺，即中国将更加注重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机遇，特别是携手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正确义利观的提出，不只是回应世界对中国责任的期待，不只是为了中国更好地走出去，也是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乃至引领世界发展的一种理论自觉，并向世界表明，一个不断发展的中国必将是一个开放、包容、负责任的中国。

其三是“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追求的是利益兼顾、义利统一。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也是当代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个行为准则，极大塑造了中国外交的品格、视野，并提升了中国外交的道义精神。习近平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即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他对“利”也做了明确的诠释：“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② 中国曾大力支持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注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当前更是致力于通过南南合作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地位、推动世界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其四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实践作风。中国文化历来讲求言必信、行必果，中国人历来追求的是行胜于言的道德情操。中国外交一直言出必行，在过去几十年里给予发展中国家力所能及的帮助，在国际上一直为它们仗义

^① 谢益显：前引书，第284页。长期研究中国对非援助的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认为，虽然现在欧美国家也开始强调尊重受援国的“主事权”（Ownership），但西方人要彻底改变他们长期抱有的盛气凌人、高人一等的观念和做派，要与受援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所有这些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33.

^② 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10日。

执言，这是中国能够得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坚定支持的重要原因。早在 2013 年习近平访问非洲时就曾明确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合作理念，其中“实”就是要践行承诺，不折不扣地落实对非互利合作的方针和举措，始终向非洲朋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与帮助。“只要是中方做出的承诺，就一定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① 在 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之后的三年间，中国如期向非洲国家提供了 600 多亿美元资金，支持中非双方开展议题广泛的“十大合作计划”，全面助推非洲发展显著提速和中非互利合作迈向新台阶。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再次承诺向非洲提供 600 亿美元支持，在未来 3 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在 2013 年召开的周边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其中“诚”就是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② 中国以“一带一路”为牵引，全面推动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与人文交流，为亚太地区营造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大趋势大环境。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体现在哪里？无需否认，如同任何国家一样，中国外交首先服务于自身的利益需要，中国在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同时，也希望拓展在海外的商品和资源市场，寻求必要的政治支持，以及提升中国在若干重要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从一开始就有一种超越国家利益的大国责任和道义精神，这在中国逐步实现自身发展进而能够为世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之后更是如此。如果说中国成功实现自身 14 亿人口的减贫与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重大贡献，那么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又更加积极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与治理进程，则是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大贡献。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理念和实践，充分体现了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

中国倡导和践行正确义利观，还能为世界贡献“中国标识”的新型国际关系伦理。世界大国奉献给世界的，不只是商品、技术和资本，还有更为深层次的思想、观念、制度以及伦理和道德精神。中国积极倡导公平、正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践行正确义利观，用

① 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6 日。

② 习近平：《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载《人民日报》2013 年 10 月 26 日。

最为精练的语言向世界表达了一种新型国际关系伦理，为全球伦理价值观的塑造贡献了中国智慧。西方传统现实主义基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理性人”假定，认为国家的根本目标是实现自身权力最大化和利益最大化，这极大影响了西方国家的战略思维，不同形态的帝国思维、霸权思维、殖民思维、冷战思维、零和思维，都体现了西方烙印的权力观和利益观。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味追求“美国优先”，以及多个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民粹主义情绪的膨胀，这都严重损害了国际社会的相互合作进程，给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正确义利观是对现有国际秩序及国际关系伦理的积极补充和修正，因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意义。

践行正确义利观的新思路与新举措

在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外交不断推出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断取得新发展、新成就、新气象。

其一，以“一带一路”为新纽带，不断提升与发展中国家的全方位互利合作。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步由资本净输入国发展成资本净输出国，由主要强调“请进来”发展成“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并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合作倡议，一个重要背景和初衷就是要通过更为全方位的“请进来”与“走出去”，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显著加快向西开放的步伐，构筑起方位更加平衡、领域更加宽广、时空更加开放、内外联动更加紧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过去几年来，中国积极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断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合作与人文交流。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逐步由基础设施建设和工程承包提升到包括产能合作、金融合作、科技合作、经验交流、能力建设等更广泛的领域、更高层次的合作。2018年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就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题，进一步促进中非合作发展。中国还要充分利用好诸如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等新的多边投融资平台，以及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吸引更广泛的投资主体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国资本、管理、产能、技术、经验更多更好地走出去，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机遇与合作选择。

其二，以“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为新契机，更好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

减贫进程。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对外援助理念、政策和方式日渐成熟，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体系与援助模式。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扩大以及参与主体的显著增多，对外援助“碎片化”问题也较为突出，援助和发展的有效性也有待提高，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国际合作也有待加强。在此背景下，“国际发展合作署”应运而生。以“国际发展合作署”而非“对外援助署”命名，本身就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两个信息：一是表达了中国对受援国的尊重，因为发展合作远比单方面的援助更体现出双方的对等性，体现出中国对受援国主体地位和主事权（Ownership）的尊重；二是表达了中国对受援国发展的强调和重视，中国对外援助着眼于通过援助撬动受援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增强受援国的内生发展动力，做到“授人以鱼也要授人以渔”。援助之所以必需，是着眼于受援国逐步实现自主发展而最终不需要援助。如果说西方大国的对外援助主要是一种“民主援助”，强调受援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建设，或者是一种“福利捐助”，主要着眼于教育、卫生和健康等领域，那么中国的对外援助则是一种“发展援助”，强调对受援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着眼于提升受援国的发展和治理能力。^① 中国援建的肯尼亚蒙内铁路，着眼于整个东非铁路网建设，今后将连接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南苏丹等东非国家，成为推动东非发展的一条“铁路大动脉”，堪称新时代中非发展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其三，以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新的着力点，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建设。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三大发展难题：基础设施滞后、资金短缺和人才不足。西亚非洲国家“向东看”，拉美国家“向西看”，都不只是看重中国不断增加的对外投资和援助，还希望学习和借鉴中国的治国理政与发展经验，希望独立自主地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复兴。中国也积极推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以此提升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和治理的能力，同时增进自身在国际发展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中国发展模式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探寻现代化的一种成功探索，独立自主、发展主义、社会共识、有为政府是其显著特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通过平等的交流互鉴，不仅可以让发展中国家获得从事发展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也能让它们体会到中国的积

^① See “Guide to the Indicators, FY 2016”, <https://www.mcc.gov/resources/doc/guide-to-the-indicators-fy-2016>, 2018-03-29;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 <http://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data>, 2018-03-29.

极创业精神与实干精神，进而增加它们从事本国发展的信心和激情，同时，也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提供新的选择和借鉴，后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更具长远意义。曾几何时，发展中国家要么学习苏联模式，要么学习美国等西方模式，如今中国发展的成功无疑给发展中国家展现了一种新的激励、新的选择和新的希望，也推动发展中国家以一种新的自信、新的面貌、新的精神参与全球经济体系。^①

其四，以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为新助力，推动世界关注和解决紧迫的全球发展和治理问题。中国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与完善，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改革既有的治理体制“存量”，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机制的改革，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注重提升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二是做好治理体制“增量”，重启亚太自贸区建设新进程，不断夯实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继续深化上合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的合作，与拉美国家搭建了中拉合作论坛机制，实现多边机制在发展中国家的全覆盖。中国还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近年来，中国还积极利用主场外交推动解决全球发展问题，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邀请了多个发展中国家与会，2017年9月的厦门金砖峰会和2018年7月的约翰内斯堡金砖峰会采用了“金砖+”合作模式，都是中国利用国际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体现。总体来看，中国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与完善的一个基本诉求，是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治理问题，携手各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多更好地关注全球发展问题，努力提升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稳定、复兴。正确义利观正是中国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与完善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正确义利观，不断推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不断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跃上新台阶。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中非双方一致同意把中非关系升级为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

^① 罗建波：《非洲国家的治理难题与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3期，第74~97页。

结协作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非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享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与中东关系方面，2018 年 7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宣布建立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阿关系迈向新的历史阶段。在与拉美合作方面，2015 年 1 月，中国同拉美国家召开了首届中拉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中国与拉美国家整体合作由构想成为现实。中拉双方决定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三大引擎”，推动中拉务实合作全面发展。在 2018 年 1 月召开的中拉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中方建议中拉共建陆洋一体的大联通，培育开放互利的大市场，打造自主先进的大产业，抓住创新增长的大机遇，开展平等互信的大交流，共同打造领域更宽、结构更优、动力更强、质量更好的中拉合作新局面。^①

余论：践行正确义利观需统筹几大关系

虽然正确义利观集中表达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世界责任与道义精神，但要践行好正确义利观、更好地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还要思考并统筹好以下几大关系：

其一，要辩证理解国家利益与世界愿景的相互关系。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既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也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我们要看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向世界提出的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愿景，也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追求目标和进取方向。它不仅关乎世界人民的根本福祉，也直接关系到中国自身发展所需良好外部环境的塑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将会为中国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国家实力的增长又能够为世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因而新时代中国外交在追求国家利益与世界愿景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与一致。

^① 王毅：《新时代跨越大洋的牵手——王毅外长在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01/23/c_1122303902.htm，2018-07-28。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首要追求目标，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中国外交最为重要的职责与任务。因此中国参与全球事务、推进全球治理的程度、广度、深度以及具体途径与形式，都需要基于维护和拓展中国自身利益这一基础之上。

其二，要权衡参与全球治理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自然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世界和平、发展和治理做出更大贡献，但同时也要在这一进程中不断提升中国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还要权衡与自身利益的关联度，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权责平衡的原则。中国无疑是个世界大国，但就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而言，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实现减贫和发展的重要任务，仍然存在严峻的国内发展和治理问题。当前，中国的发展处于近代以来的最好时期，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一目标的信心和能力，但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这本身就说明中国还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攻坚阶段，处于“将强未强”的特殊历史时期。因此，参与全球治理仍需要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原则，在自身实力、地位、能力基础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参与全球治理也要注重权责平衡的原则，承担的责任、义务需要与自身权力、利益的增进相匹配，付出的国际投入也需要与自身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相一致。在当前西方民粹主义不断发展、美国特朗普政府执着追求“美国第一”的背景下，全球治理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者，参与全球治理的成本增加，成效却可能在减少。由此，中国更需要清晰厘定自身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全面盘点自身国际收支清单，在自身实力和利益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中国独特的角色和作用。

其三，要注重实现经济建设、安全治理与人文交流的协调发展。中国践行国际关系中的正确义利观，展现对发展中国家的真诚与友好，其实现途径、方式不只是在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方面给予帮扶，也包括同样重要的安全合作、人文交流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支持等更为广泛的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里，中国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关系总体上以政治合作为主，20世纪80年代后双方合作体现为以经贸合作为引领，进入21

世纪之后逐步向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形式日趋多元、合作成效更加显著的阶段迈进，这一进程在当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显著推动下更趋深入发展。但与快速发展的经贸合作相比，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合作与人文交流仍有待加强。张宏明研究员认为中非合作的行稳致远既需要加强安全合作的“硬保障”，也需要加强人文方面的“软支撑”。^①这是因为安全合作硬保障不仅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维护政治稳定，进而为其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同时也有助于保护中国不断增长的海外利益，不断提升中国在海外的安全能力建设与安全经验积累，这也是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重要体现。而正在不断深化的人文交流特别是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不仅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探索更为自主、更为独立、更富特色的发展道路，推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认识、理解和信任，同时也能够通过对外展现中国发展成就、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显著提高中国发展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进而提升中国在世界感召力和塑造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不只是利益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

其四，经济合作与规范制定要齐头并进。从一个长时段来看，全球化在不断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也在深入推进，如何为全球化制定游戏规则，如何为全球治理制定规则规范，自然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制高点，也事关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长期以来，主要西方大国一直主导着国际经济规则和制度的搭建，近年来日本等国积极推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达成及实施，也是旨在以规则规范的搭建提升相关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水平，增强自身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和优势。美国特朗普政府看似对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并不热衷，其实并非是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本质上是“以退为进”，试图通过单边或双边的方式按照“美国第一”原则重塑国际规则，建设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括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修改。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自然需要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主动参与国际规则规范的制定，努力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呼声。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底端，承受着全球化带来的主要挑战和风险，如果仅仅以所谓绝对的

^① 张宏明：《中非政治互信在价值层面互动所面临的困局与破解思路》，载张宏明：《非洲发展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

“对等”“互惠”来界定国际经贸合作，那么这种看似公平公正的对等交易必然带给发展中国家巨大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经贸合作不能只是讲求数字对等的“形式正义”，更需要切实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处境，进而关切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要的“实质正义”。因此，中国既要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也要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双边合作中主动塑造更加符合各方利益需求的制度和规则，特别是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及早考虑到制度与规则的制定，进而实现经济合作与规范制定的相互促进。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携手发展中国家制定新的制度、规范和规则之时，也要适度考虑到中国自身实力不断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现实，给相关制度、规范和规则保留足够的弹性和应有的发展空间，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不断发展的利益需要。

其五，要塑造国际形象，推进国内治理建设。中国“走出去”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多重红利：价格相对实惠的商品、基建融资和资源开发、创造就业和技能转让、激发创业激情和企业家精神以及中国发展经验的借鉴，由此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赞誉。^①但中国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某些领域的合作还存在无序和低端状况，整体还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这要求中国更加积极回应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特别是要求“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或中国人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深度融入当地社会，并为当地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真正体现中国人的正确义利观。要切实提高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社会责任，中方需有效规范中国人的海外行为，这不只是一个外交外事工作问题，也不是靠外事管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所能解决的，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涉及国内治理建设的大问题。这是因为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在海外的表现，其实是它们/他们国内观念、认识、行为和经验的自然反映而已。从长远看，中国需要建立更加清正严明的法治体系、更加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更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同时不断普及和提高全体公民的公共意识和公益意识，中国企业或中国人“走出去”才会有更好的表现和赢得更好的声誉。

^① 在2014年至2016年三年间，美国知名独立民调机构皮尤中心曾连续在全球36个国家对中国和美国的形象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非洲、中东和拉美的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最高，其中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好感要明显好于美国。Afrobarometer, *China's Growing Presence in Africa Wins Largely Positive Popular Reviews*, Dispatch No. 122, 24 October 2016, pp. 1-24; Pew Research Center, "In Global Popularity Contest, U. S. and China - not Russia - vie for first",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8/23/in-global-popularity-contest-u-s-and-china-not-russia-vie-for-first>, 2018-05-02.

The Values of Justice and Shared Interest and China's Diplomacy towards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Luo Jianbo

Abstract: The values of justice and shared interest are the important values of the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ir core meaning lies in the comprehensive and dialectical elab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stice” and “interests”, which embodies making justice and interests compatible and refraining from seeking interests at the expense of justice in foreign affairs in view of morality and responsibility, upholding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treating each other as equals in view of power and order and promoting mutual benefit and common development in view of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values of justice and shared interest focus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world pursuit of “Great Harmony” in China’s diplomacy, the introverted style of self-discipline,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giving priority to justice, and the practical style of being trustworthy in words and resolute in deed. To practice the values of justice and shared interes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should tak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a new link,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as a new opportunity, the exchange of governance experience as a new growth point and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s a new impetus. By sharing more China’s opportunity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ontributing more China’s programs, wisdom and views to the world, the struggle direction of China’s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is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peac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le safeguarding and improving its own interests.

Key Words: The Values of Justice and Shared Interest;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frica

(责任编辑:冯基华 责任校对:詹世明)